

《纽约时报》畅销书

陪审团睡了

美国当代名案审判纪实

[美] 多米尼克·邓恩/著



强烈的正义感促使邓恩进入上流社会中的犯罪世界，他并不假装客观，而是毫不掩饰对名流案件中经常出现的司法不公现象的极大愤慨。

中信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陪审团睡了

美国当代名案审判纪实

(美)多米尼克·邓恩/著

吴文忠/译

中信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陪审团睡了：美国当代名案审判纪实 / [美] 邓恩著；吴文忠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8

书名原文：Justice: Crimes, Trials, and Punishments

ISBN 7-80073-900-7

I. 陪… II. ① 邓… ② 吴… III. 刑事犯罪—审判—案例—汇编—美国 IV. D97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68860号

Justice: Crimes, Trials, and Punishments by Dominick Dunne

Copyright © 2001 by Dominick Dunn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2 by CITIC

Publishing House/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is Agency,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陪审团睡了：美国当代名案审判纪实

PEISHENTUAN SHUILE: MEIGUO DANGDAI MING'AN SHENPAN JISHI

著 者：[美] 多米尼克·邓恩

译 者：吴文忠

责任编辑：蒋 蕾 陈永华

出 版 者：中信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经 销 者：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承 印 者：北京今典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1.75 字 数：318千字

版 次：2003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辽权图字：06-2003-143

书 号：ISBN 7-80073-900-7/D·124

定 价：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010-85322521

E-mail:sales@citicpub.com

010-85322522

前 言

尽管我以观察家的身份观察生活已有40年，但直到50岁时我才开始写作。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尝试着各种职业，我在好莱坞的影视生涯已完全终止，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一筹莫展。从事写作的想法我曾考虑了很长时间，但直到从那早已不属于我的、星光灿烂的世界搬到俄勒冈州喀斯喀特山里一个单间住所后，我才真正开始创作。在那里，我开始了我的第二次生涯：写作和记录当时的社会历史。第一部书的框架在我离开好莱坞的前一年就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曾经共事过的剧组人员中有过这样的传言，说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的总裁戴维·贝戈尔曼曾假冒奥斯卡获奖演员克利夫·罗伯逊的名义开具了一张1万美元的支票，但是这个丑闻在洛杉矶当地的报纸上却只字未提。这是权力人物在作祟，拉上舞台的大幕是为了保护他们中的某个人。我目睹了这件事的发生，对这个事件着了迷。在无工作的日子里，我有充足的时间回味它。我不停地打电话，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此事。我不仅认识剧组中的所有演员，还认识他们的夫人、代理人、秘书和情妇。

我的生活中充满了偶然事件，这是我一生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在贝弗利山酒店的大堂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认出了我（我正与我的代理人一起吃午餐，代理人告诉我，我的前途完蛋了，这一点我早已知道）。我不是那种远近闻名的人物，他认出我不是因为我的名气，原来我的一个弟弟在乔治敦上学时和他是同学，他是根据长相认出了我。他介绍自己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而他的任务竟然是采访那件长期被捂着盖着、令我十分着迷的伪造支票事件。他告诉我，克利夫·罗伯逊当时的妻子、女演员迪娜·梅里尔曾去找《华盛顿邮报》的老板格雷厄姆夫人，告诉了她这起被掩盖的伪造支票事件。格雷厄姆夫人

即派了这名记者和一个伙伴去调查此事。可是没有人愿意和他们谈话，秘书们不给他们接通电话，或者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未能收集到任何重要的东西来证明迪娜·梅里尔所说的事情。这位记者和我见面这个偶然事件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它最终改变了我的后半生。对他来说，我犹如天赐之宝，对我来说，他好比同志知音，我终于可以倾诉出这个想让世人皆知的事情了。贝戈尔曼事件是我日益憎恨的好莱坞邪恶中的典型案例。坦白地说，我的动机里也有一点儿报复的味道，因为我是从那里败下阵来的。我知道这位记者要寻觅的大量内部情报，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包括那些电话簿上没有登载的电话号码。我和这位记者及他的伙伴度过了一周，同他们一起开车外出，看他们调查并将其编撰成文。他们将此事公布于天下，知道我在其中起到了作用，这使我非常兴奋。这种激动心情我在影视圈里已好久没有感觉到了。我想，这两个人做的事情我也能做。这点我颇费时日才做到，但是记录的都是事实，最终成了这一本书——我为《浮华世界》（*Vanity Fair*）杂志撰写的一系列犯罪和审判的故事收集在这本书里。顺便提一句，冒领支票的那位影业公司的老板只需与一位好莱坞著名的心理学家出席几次法庭调查会作为惩罚。后来他成为米高梅影片公司的总裁，继续受到邀请出席各种宴会，而且每逢星期日晚上便在他家的放映室里为名流们放映最新的影片。而那位被他盗名的奥斯卡获奖演员再也没有在好莱坞演过什么重要角色。几年后，贝格尔曼在世纪广场大厦的一个房间里开枪自杀，他的遗孀送给我一顶我曾经赞扬过的他戴过的草帽。

我生活中的一个悲惨事件永远地改变了我。1982年，我的独生女达米尼克被她的前男友约翰·斯威尼杀害，他是悄悄接近她将她扼死的。在女儿被害之前，我从未出席过任何审判。事实上，在这场悲剧发生之前，我就像风中的一片羽毛，随风飘荡，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在那个法庭上的所见所闻使我愤怒，从而也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谎言如此地得以轻信，这使我震惊；法庭辩论犹如娱乐界的一场闹剧，司法尊严已不复存在。杀害我女儿的凶手打扮成了天主教教堂的司事，他甚至还拿着《圣经》当做道具，以虔诚的

语气从头至尾读着里边的内容。他的律师指出他是一个蓝领青年，说他爱上了贝弗利山上流社会的一个女孩。我恨死了他的律师。我在那个法庭上明白了被害者权利与被告权利的不平等，对死去的人什么都可以说，他们就是这么做的。而凶手殴打女性的严重前科却被瞒着不让陪审团知晓，另一个被他暴力伤害而住进医院的受害者所作的证词则被判定为无效。这次审判成为对法律的嘲弄。审判的全过程都做了电视录像。原来那位法官与原告有着个人恩怨，我恨透了他。陪审团被朗读《圣经》的表演所打动，判那个后来改了名字的约翰·斯威尼6年有期徒刑，而6年又自动减为3年。两年半之后他即获释。尽管我知道人不能生活在仇恨之中，却一直怒火中烧。我的愤怒需要发泄，脑子里一直有雇个人去把他干掉的想法，好几个月来我都这么想，这对一个被害孩子的家长来说并非反常。但是与那个凶手不同的是，如果我那么做，我就会遭到终身监禁，因此我拿起了笔，不仅写出这个事件的真相，而且写出情感的折磨，写出那段时间留给我、我的妻子、我的儿子们的永久伤口。我为杂志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那次审判的全过程，文章于1984年3月登在《浮华世界》杂志上，这篇题为《呼唤公正》的文章得到社会积极的反响，使我意识到了文笔的力量，文章在一些法学院被作为教学资料，让学生知道一场审判会被弄得多么的糟糕。我为此而自豪，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与命运同步了。我迷上了审判，出席了过去15年中对许多名流的审判，包括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我对被告辩护律师那种不择手段的做法深恶痛绝，为了能开脱罪犯他们什么都能做。其他记者们会对我说：“他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多米尼克。”可是我怎么也不会让自己去这么想。

我开始卷进我所报道的某些案子，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有过亲身的经历。在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克劳斯·冯布洛审判（Claus von Bülow trial）期间，我作为已是植物人的逊尼·冯布洛的两个孩子——艾拉·冯奥尔斯佩格公主和亚力山大·冯奥尔斯佩格王子的客人，在他们漂亮的纽波特庄园克拉伦登大楼度过一个夜晚。逊尼的一个朋友——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安排了我们认识。艾拉和亚力山大领我看了克劳斯和他们母亲的卧室，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使她20年后仍

处于昏迷状态。她的Porthault床单仍铺在床上，那一年送给她的圣诞节礼物也一直没有打开。我来到这间卧室时感到十分兴奋，这使我感到一阵内疚。就在那一刻，我进入了故事中，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记者们对此会说：“糟糕的新闻。”我反驳说：“那又怎样！”事情碰巧被我遇上，我看着它们发生，后再撰写成有关它们的文章。后来在冯布洛一案的审理期间，我来到逊尼·冯布洛在纽约第五大街的豪华住宅出席一次复活节午餐会。我与克劳斯的情妇安德烈亚·雷诺兹坐在逊尼的床上，她向我展示珠宝首饰，说它们完全可以和逊尼的媲美。我们使用的餐具都是逊尼的，大龙虾色拉是一位带着白手套的华人管家端上来的。这真如梦幻一般。我总对自己这么说：“我真不能相信我在这里看着所看到的一切。”第二天我们回到普罗维登斯的法庭，在法庭上，冯布洛以企图谋杀罪受到审判。

审判可能会变得无聊，但是审判中所涉及的那些人的生活对我来说却绝不乏味。我是洛杉矶社交界名流艾尔弗雷德·布卢明代尔和贝齐·布卢明代尔的朋友，在艾尔弗雷德死后，我报道了对那个将艾尔弗雷德的情妇维基·摩根残暴杀死的疯子的审判，他是用棒球棒将她打死的。我和O·J·辛普森的姐妹也成了朋友，姐妹俩都很高雅，但是我每个月写报道时都认为辛普森有罪。我第一个报道了年轻英俊的莱尔·梅嫩德斯带着假发，这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是由莱尔的假发制造商主动提供给我的。杜邦财团的女继承人莉萨·迪恩·莫斯利，早在20世纪50年代她刚进入社交界时我就认识她了，她的丈夫雇人杀死了他的继子所爱的吸毒妓女，在拉斯韦加斯受到审判。在上寄宿学校时，我比迈克尔·斯凯克尔的父亲低两个年级，1950年我还出席了他姑姑埃塞尔与罗伯特·肯尼迪的婚礼。

在O·J·辛普森一案裁定的前一天，我在电梯里邂逅的惟一乘客，竟然是辛普森与第一任妻子的儿子贾森。在长达9个月的审理中，他对我一直充满了敌意，我们从未说过话，但是那天在电梯里他却跟我说了话。他问我：“诺曼·利尔家的宴会怎么样？”他指的是几天前我在《全家人》(All in the Family)的创作者家里出席的一次社会名流晚宴。“你怎么知道我出席了诺曼·利尔的晚宴？”我吃惊地问。他

告诉我，当我正在餐厅里用诋毁的语言谈论他父亲时，他正在厨房里做领班。我想，**天啊，事情怎么会这样！**但是这类事情经常发生在我身上。一个年轻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递给我一份由迈克尔·斯凯克的父亲雇用的私人侦探提供的秘密报告，这份报告揭露了迈克尔25年前杀害了15岁的马莎·莫克斯雷，从而导致他受到了起诉和审判。亿万富翁银行家埃德蒙·萨夫拉，于1998年12月3日在他的蒙特卡洛顶层公寓里窒息身亡，我在纽约“21”俱乐部偶然遇到金融界的一对著名夫妇，他们使我了解了萨夫拉神秘生活的内情以及他更为神秘的死亡内幕。当我正准备悄悄地早点儿离开纽约的一个聚会时，一位侍者在帮我穿上大衣时轻声对我说：“我有件事儿要告诉你。”他讲的是我当时正在报道的一个案子。还有一次，我正在棕榈滩的巴西法庭旁听威廉·肯尼迪·史密斯一案的审理，夜里我入睡之后，有人打来电话，是那个指控史密斯犯有强奸罪的女人——帕特里夏·鲍曼，她说：“我今天在法庭上看见了你。”她请我去她家里，我得到了她给予的惟一的采访机会。

在过去50年的生活中，我一直怀着好奇心在富人、名人和权势人物中间走动，总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在倾听、在观察、在记忆。在本书的许多故事里，我或是与受审的人，或是与被害者，或是与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交往，这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有人还鄙视我，像肯尼迪一家、斯凯克一家、克劳斯·冯布洛、O·J·辛普森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在棕榈滩威廉·肯尼迪·史密斯强奸案审理时，我与肯尼迪一家的4个女眷就隔着过道而坐，我们互相都认识，但都没说话。在洛杉矶审理梅嫩德斯兄弟杀害父母一案时，我成了他们的辩护律师莱斯利·艾布拉姆森的敌人。乔斯·梅嫩德斯生前是好莱坞某个财团的总裁，在贝弗利山公寓里被他的两个儿子用枪打死。尽管他强硬、不受人喜欢，而且作为父亲也过于严厉，但是在法庭上给他编造的那些谎话简直使他变成了最卑鄙的性变态者，这一切令我恶心。据一位探望过莱尔·梅嫩德斯和埃里克·梅嫩德斯的可靠人士讲，那兄弟俩从不谈论谋杀事件，但却很后悔参与了诋毁他们的父亲。他们被分在两处服终生监禁，没有可能获得假释。我渴望有一天能亲自去监狱探

望他们，想看看他们是否能告诉我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O·J·辛普森一案的审理中，我在法官兰斯·伊藤的允许下有一个固定坐位，为此我收到了咒骂和恐吓信件，并在法庭外面受到人群的嘘哄，原因是我立场鲜明地认为辛普森有罪。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进行斯凯克尔-莫克斯雷一案的听证会之后，小罗伯特·肯尼迪写文章对我进行攻击，但是我也写了文章回敬他。我曾经看到纽约的女招待们在最后一刻变换坐位卡，因为原来安排在我旁边的那个人不愿意挨着我坐，只是因为我正在写的某个故事。我决不介意，真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不知怎的，这种事情总是有一点儿联系，而且我总能将其写进我的某本书里。

这真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奇事，一场悲剧使我走上了有如此回报的写作生涯。能够说出“我热爱生活”这句话，是如此的美妙，而我也确实做到了。当我的女儿即将从锡达斯-塞奈医疗中心的生命维持系统解脱下来时，我们全家人都一起进去和她说话，然后我们又分别进去各自和她道别。他们已将她的一头美发剪掉，她肯定会讨厌这么做。我亲吻她的光头，对她说：“把你的天分给我吧。”她做到了。我由衷地相信，是她，指引我走上了这条伸张正义之路。

目 录

前言

呼唤公正：一位父亲泣述对杀女凶手的审判/ 1

带着秘密死去的女人/ 37

富人的审判/ 49

埃尔姆大道上的弑父双命案/ 83

世纪审判/ 113

残忍与高贵/ 247

变童、女继承人和蜡烛架/ 271

摩纳哥疑案/ 293

一桩沉冤25年的谋杀案/ 315



呼唤公正： 一位父亲泣述对杀女凶手的审判



漫长炎热的夏季开始了。1983年7月5日，我飞到洛杉矶，也不知道要待多久。飞机从纽约起飞之后，我一直与旁边的乘客攀谈，以缓和心中的恐惧之感。我的两个儿子——格里芬和亚历克斯已在我之前离开纽约。次子亚历克斯在机场接我，我们驱车到达贝弗利山的住所，这里住着我的前妻埃伦·格里芬·邓恩，大家都叫她莱尼。她患有多发性硬化症，一直与轮椅为伴。格里芬已经在这里。这里不是我们全家的住所，房子较小而且只有一层。为了出席一次谋杀审判案，我们一家人又聚到了一起。

我第一次见到莱尼是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火车站，当时她正在下车，她的样子简直令我陶醉。那一刻我就知道，只要她愿意，我就会和她结婚。1954年，在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她家的牧场里，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我们在纽约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搬到了贝弗利山，在这里的影视圈里，我一工作就是25年。我们有过5个孩子，其中两个出生之后没几天就夭折了。我们已经离婚多年，但是又好像从来没有离婚，也不知道这样说对与不对。许多年来，我经常这么想，如果我们在婚姻的困难时期能坚持下来，也许我们的生活会好一些，但不知道她是否也这么看，我们从不谈论“假如”。在谈话中我还称她为妻子，而不是前妻，没有一天我脑海里不浮现她的音容笑貌。我们

保持着联系，并给对方邮寄剪报。我也不像从前那样讨厌称呼她为埃伦·格里芬·邓恩夫人，以前我只称呼她为多米尼克·邓恩夫人。

1982年10月31日早晨5:00，纽约公寓里的电话铃声把我吵醒，我拿起电话筒时就预感到了灾难。洛杉矶刑侦局的哈罗德·约翰斯顿探长告诉我，我的女儿达米尼克正生命垂危，躺在锡达斯-塞奈医疗中心。我问他是否已经通知了我的妻子，他说他是在她的家里打的电话。莱尼拿过话筒说：“我需要你。”

“发生了什么？”我忐忑不安地问道。

“斯威尼。”她答道。

“我乘最早的航班过来。”

我打电话给27岁的格里芬，他住在纽约离我有两个街区远的地方。几分钟之后他来到了我的住所，给环球航空公司打电话预订了下一航班的机票，然后又去自动取款机为我取了钱。当往行李箱里扔衣服时，我对那套黑色西装及领带有些犹豫，认为它们会给我带来厄运，但还是把它们装了进去。我上出租车之前，和格里芬拥抱吻别。他还得去我二儿子亚历克斯的住所，告诉他这个噩耗。亚历克斯很有个性，住在纽约偏僻的皮特街，家里也没有装电话。当达米尼克把约翰·斯威尼介绍给我们时，我们4个人当中只有亚历克斯说出了对他没有好感。

几个月前，达米尼达把斯威尼带到纽约介绍给我和我的两个儿子。达米尼克是一位很成功的电视演员，她刚刚拍完她第一部担纲主角的故事片《鬼追魂》(Poltergeist)。斯威尼是好莱坞西区一家餐馆马麦森饭店的后厨领班，这家餐馆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乐于追逐时尚，普通餐客打进电话，餐馆竟然会劝他别来此用餐。我们看了一集达米尼克友情出演的电视连续剧《名声》(Fame)，然后出去吃晚餐。有一刻只有我们4个人，我的两个儿子逗达米尼克，问她是不是在考虑结婚，她说不，她不会和他结婚。我知道她说的是心里话，这令我很放心。尽管我能看出斯威尼对她大献殷勤，可是他身上的某些东西却令人生厌。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告诉她妈妈：“他爱她远远超过她爱他。”莱尼说：

“你说得很对。”

第二天早上，亚历克斯告诉我一件我走之后在克拉克酒吧里发生的事情。斯威尼去洗手间时，酒吧里的一位男子认出了达米尼克就是演《鬼追魂》里姐姐角色的人，并说出了她在剧中的一句台词：“发生了什么事？”在剧中，邪恶的幽灵开始占领她的家园并制造恐怖的事情时，达米尼克喊出了这句台词，电视里经常播放剧中的这个片段，因此这句台词为人熟知。这位稍微喝多了点儿的追星族并没有挑逗的意思，只是因为看见了一位他认识的演员而表示高兴。但是斯威尼回到座位看见那个人和达米尼克说话，便暴跳如雷，他抓住那个人的衣领，使劲摇晃他。亚历克斯说斯威尼的举动太过分，还说他那样子够吓人的。

第二天，我比约定时间晚几分钟来到卢泰斯饭店，和达米尼克、斯威尼共进午餐。他们还没有到，因此我就坐在酒吧的一张桌旁等他们。我喝了一杯毕雷矿泉水，又要了一杯，正开始怀疑是不是我们约定的时间或是地点弄错了时，他们走进了餐馆。当时正是盛夏，达米尼克穿着一件上过浆的白色蝉翼纱连衣裙，样子美极了，绝对是加利福尼亚风格。我马上意识到她曾哭过，而且他们俩的关系很紧张。

大厨师对斯威尼表示热烈欢迎，吻他双颊，他们还用法语交谈。在大厨师的建议下，我们吃了那天的特色餐。不管饭菜如何，反正午餐吃得并不愉快，我发现斯威尼很紧张，局促不安，也不愿意说话。我突然想到，也许达米尼克难以摆脱这个人，但我也没有过多地去想它。

7月4日独立日这天，我们3个人来到布鲁克林大桥下河畔餐厅吃饭。夜晚的景色很是迷人，我们坐在一张靠窗的桌子旁，以便观看天上的焰火。斯威尼告诉我他打算离开马麦森饭店，他说得到一个法国和日本商人组成的财团的支持，准备在洛杉矶的黄金地段梅尔罗斯公园开办自己的饭馆。谈话中他对老板——帕特里克·特雷尔颇有微词，特雷尔是拥有巴黎银塔餐厅的法国餐饮家族的成员之一，我猜想他们之间的关系肯定不好。

在飞往洛杉矶漫长的旅途中，我挣扎着想摆脱达米尼克会死的想法。她正在为华纳公司拍一部叫做《V》的电视连续短剧的样片，准备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播放，可是现在看来，这得等她好起来时才能再拍摄了。5周之前她已与约翰·斯威尼分手，他从他们在西好莱坞区的房子里搬了出去。当时她对我的解释是：“他不是在爱我，爸爸，他是对我着了魔。他快使我发疯了。”

在达米尼克出生之前，我的另两个女儿死于婴幼儿的一种呼吸衰竭症，这在当时的剖腹产中是一种常见病，叫做“肺透明膜病”。对我们来说，达米尼克就是三个女儿的化身，因此她受到三倍的爱护，她也非常崇拜她的两个哥哥。在这个世故的社会里她仍能保持纯真，总收留无人收养的小动物，她的小动物园里有一只做过脑叶切除手术的小猫和一只腿发育得不全的大狗。她上过洛杉矶的西湖学校、康涅狄格州的塔夫脱学校，然后进了科罗拉多州的温泉谷学校。那之后，她去意大利待了一年，学会了讲意大利语，我和她在意大利旅游过两次。她感情极为丰富，且易激动，当莱尼由于病情恶化不能再正常生活，而离开我们在沃尔登大道的住宅时，她哭得令人心碎。当达米尼克宣布她打算做一名演员时，我并没有感到惊讶。既是演员又是制片人的格里芬后来逗趣说，她一决定了当演员，下一周就到外景场地去拍电影了。她几乎梦想成真，因为她喜欢演戏，十分热爱自己的事业。

我在那个星期日的中午到达洛杉矶时，所有的电视新闻节目中都在播放着这样的报道：达米尼克在她家外边被其前男友扼颈窒息，现正在锡达斯-塞奈医疗中心处于昏迷状态。《乐队中的男孩》（*The Boys in the Band*）（我曾将它改编成电影）的作者马特·克劳利在机场迎接我，他把从莱尼那里了解到的一点儿情况告诉了我。我们到达莱尼在克雷森特路的住宅时，那里已挤满了人（在之后的七八天里，从早到晚都是这样。我的朋友们轮流负责接听电话，审查电话内容，端咖啡递点心，接受源源不断的花束，安排我们的日常生活），所有电视机和收音机都打开收听滚动新闻报道。在这一片混乱之中，莱尼静静地坐在轮椅上。“情况不好。”她对我说。几分钟之后我就听到屋子里的人低声

说“脑损伤”。

莱尼的母亲从广播里听到了这个消息，正在从圣迭戈赶来。格里芬和亚历克斯的航班几小时之后也将抵达。我在哈特福德的亲属都打来电话，随着消息的播出，我在伦敦和纽约的朋友们也都打来电话。医院的医生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同意给达米尼克的大脑做手术以减轻大脑的压力。“这绝对有必要么？”我问道。“绝对必要。”他回答。“那好吧。”我说。我问他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看她，他说现在还不行。

我的两个儿子脸色苍白地赶到了。当被允许去医院探视时，我们心里都充满了恐惧和焦虑。一些朋友对莱尼说：“你不能去，她这个样子时你去看她，那是个可怕的错误。你要记得她以前的样子。”当然他们是考虑到莱尼的身体，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最受不了情绪打击。她回答说：“如果我不去看她，那才是错误。我不得不去面对这个现实。”

我们四个人默不作声地穿过锡达斯-塞奈医疗中心五楼那迷宫般的走廊，前往重危病房部。我们其中一人（我忘了是谁）推着莱尼的轮椅，另两个人走在她的两侧。在以后的一年里，我们自动地以这个队形走了许多次。病房双扇大门的外边写着醒目的提示：“按铃并报明身份。”我按指令做了：“达米尼克·邓恩的家人。”里面告诉我们等一会儿，有人会来给我们开门。

有几个人站在里面，其中有演员乔治·汉密尔顿，我们相互寒暄了几句，乔治说他的弟弟也在这里，从达米尼克被送进来的那天晚上就一直待在这里。另一个人自我介绍说他叫肯·约翰逊，是达米尼克参加拍摄影片的导演。站在旁边的一位年轻演员叫戴维·帕克，也在这部影片里扮演角色，他的眼睛已哭得红肿。我们了解到，当达米尼克遭到攻击时，帕克正待在她的房子里，并且报了警，尽管为时已晚。后来我们还了解到，帕克被外边草坪上的挣扎声吓得不得了，在一个朋友的留言机上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今天晚上死了，那就是被约翰·斯威尼杀的。”

一个护士过来告诉我们，等我们看过达米尼克之后，医生要和我们谈话。她说只有直系亲属才可以进去，并让我们出示证明，他们担

心新闻界的人会冒充家人混进去。她提醒我们，看到她我们可能会受不了，让我们有心理准备。

我很担心莱尼，转过头去看她，她闭上双眼，低下头，深吸了一口气。我看着她在通过某种精神力量使自己坚强起来。这种做法完全属于她自己的隐私，即使后来我也不敢问她当时的情形。当我们进入病房时，我们4个人中她是最坚强的。

最初我没有意识到躺在床上的人就是达米尼克：她身上到处都是管子，生命维持装置使她以怪异的抽搐动作呼吸着，这似乎是对生命的嘲弄；她的眼睛睁着，睁得很大，稍稍往上，看着天花板；她的一头长发已经被剃掉，减轻大脑的压力的手术也已做完了；她的脖颈呈紫色且肿胀着，清晰可见的是将她扼颈窒息的那人的一双大手印。看着她这样子真让人揪心，可我们又不忍心转过头去。

莱尼转动轮椅到床前，双手握起达米尼克的手，用十分平静的声音对她说：“你好，我的宝贝儿，妈妈来了。我们都在这儿，达米尼克，爸爸、格里芬和亚历克斯。我们爱你。”

随着她的话，我们也走上前，围在床的四周，每个人都抚摩着达米尼克身体的一部分。护士们曾说她听不到我们讲话，但是我们却觉得她能听到，我们逐一都和她说了句话。我们祈祷她能够活下来，尽管我们知道对她来说，死亡是最好的解脱。

重危病房部有一个小型会议室，接下来的4天里，我们定期地来到这里讨论她正在逝去的生命。爱德华·布尔特霍尔兹告诉我们，脑部扫描显示的是平线，就是说表明已经没有生命，但是有必要再进行3次扫描，这样，在即将开始的审判中，被告一方就不能说，锡达斯-塞奈医疗中心过早地将达米尼克从生命维持系统放了下来。这是第一次提到审判。在这种震惊的状态中，我们还没有开始想到这是一场谋杀案这一事实。

第四天，莱尼出人意料地对医生说：“达米尼克死之后，我们愿意将她的遗体器官捐献给医院。”孩子们和我都知道这可能也正是达米尼克想做的，但是当时我们都不会想到去说这件事情，而身怀绝症的莱尼却想到了这一点。格雷·埃尔罗德医生含着眼泪说，医院里有两位

病人正等着做肾脏移植手术。在他们将达米尼克从生命维持系统解脱下来之前，我们最后一次进去和她道别。她被推进手术室取出肾脏，移植手术也几乎立即开始了。她的心脏被送到旧金山的一家医院，然后她的遗体交给验尸官进行剖检。

在攻击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天，马麦森饭店的老板帕特里克·特雷尔在《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上将他的厨师约翰·斯威尼描述为一个“非常可靠的年轻人”，并说将为他聘请最好的律师。他没有对他认识的达米尼克（他也认识我们）做出评论，而在那之后漫长的痛苦折磨期间，他既没有给我们打过电话，也没有给我们写过吊唁信。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来得及向杀害我女儿的凶手发泄满腔仇恨，所以帕特里克·特雷尔就成了我临时的憎恨对象。

他们并没有花多少钱为斯威尼聘请最好的律师，因为一位公派辩护律师迈克尔·阿戴尔森被指派代理这个案子。我们听约翰斯顿探长说，阿戴尔森名气很大，极难对付。而协助公派辩护律师的则是约瑟夫·夏皮罗，此人是马麦森饭店的法律顾问，就职于名声很大的多诺万-莱瑟-牛顿-欧文律师事务所。尽管夏皮罗后来没怎么参与辩护，但是自案发之后他去贝弗利山监狱探视斯威尼的那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法庭做出宣判后他在法庭上欣喜若狂，就说明他是一个无时不在但又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物。

在达米尼克被杀之后，新闻界一直将她的身份认定为我的弟弟约翰·格雷戈里·邓恩和弟妹琼·狄迪恩的侄女，而不是莱尼和我的女儿。最初由于处在震惊之中，我没有太多考虑此事，但是几天之后我开始觉得这有点不对劲。一天上午在莱尼的卧室里我对她提起了此事，她说：“唉，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声音里充满了绝望，使得我为自己在这么关键时刻还考虑这么琐碎的小事而无地自容。

屋子里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我的前岳母比阿特丽斯·格里芬·古德温，她是莱尼的父亲——亚利桑那州一位牧场主托马斯·格里芬的遗孀，也是莱尼的继父——保险业巨头和牧场主尤沃·古德温的遗孀。她是一位坚强的、毫不妥协的女性，在任何场合下都勇于说出自己的